

長江文明

第八輯

馆庆特辑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 编

- 徐中舒先生与博物馆事业
- 冯汉骥先生与西南博物院
- 西南博物院的文物来源与藏品管理
- 论西南博物院的学术传统
- 略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明清德化窑白瓷
-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古琴初步研究
- 从区域环境考古学角度谈重庆的旧石器



河南人民出版社

長江文明

第八輯
館慶特輯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博物館 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江文明. 第八辑 /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 重庆博物馆 编.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215-06175-0

I. ①长… II. ①重… III. ①长江流域—文化史—文集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493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印张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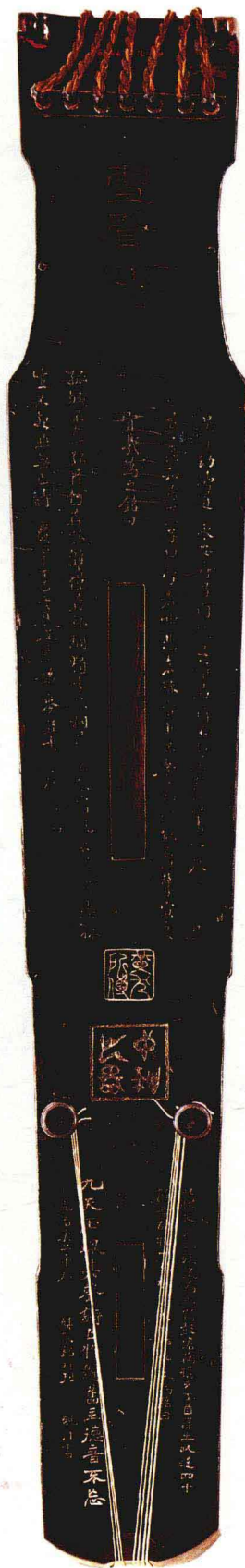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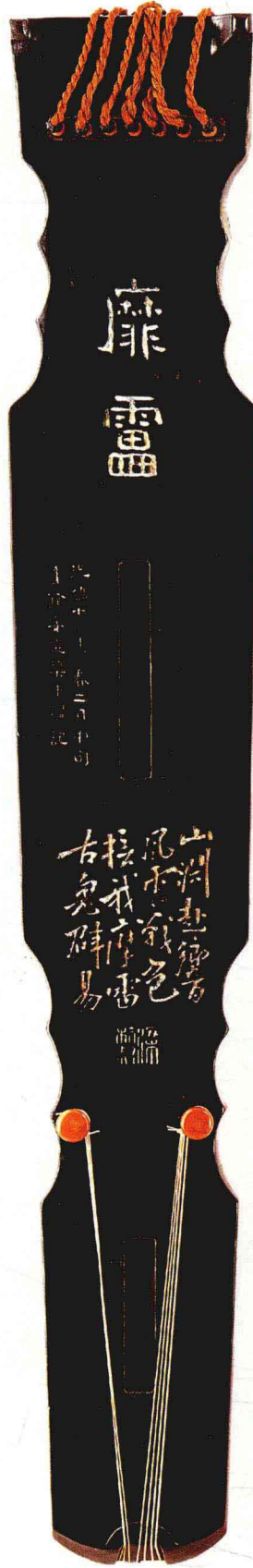
定价: 30.00 元



1. “松石间意”琴底面



2. “雪声”琴底面



3. “靡雷”琴底面



4. “松风”琴底面

长江文明



第八辑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 重庆博物馆 编

《长江文明》编委会

主 编：黎小龙

副主编：柳春鸣 唐昌伦

编 委：张荣祥 唐治泽 魏光飏

王 春 郑 丹 彭学斌

向渠奎

编辑部主任：唐治泽

责任编辑：杨 婧

编 务：艾露露 方圆远

英文编辑：杨 婧

英文翻译：谭 晓

地 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 236 号

邮 编：400015

电 话：023-63679078

E-mail: cjwm001@163.com

庆祝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 重庆博物馆

成立六十周年纪念 特辑

目 录

弘懿一甲子 奋进六十年

——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馆 60 周年

..... 黎小龙 (1)

徐中舒先生与博物馆事业 徐亮工 (7)

徐中舒与西南博物院 张 莉 (22)

回忆先父冯汉骥 冯士美 (31)

冯汉骥先生与西南博物院 夏伙根 (37)

西南博物院宝成铁路文物保护工作记 龚廷万 (46)

西南博物院的文物来源与藏品管理 胡昌健 (53)

论西南博物院的学术传统 高 远 (61)

略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明清德化窑白瓷

..... 陈丽琼 董小陈 (77)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古琴初步研究 唐治泽 (85)

“匝朶”释义及特点分析 汤绍波 (97)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土城战役红军手迹”鉴析

..... 邓又萍 (103)

从区域环境考古学角度谈重庆的旧石器

..... 贺存定 (111)

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庆抗战文化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

..... 艾智科 (120)

浅谈博物馆对少年儿童的服务与教育 ... 王玉茹 (129)

Catalogue

Li Xiaolong

- Carry forward the Sprit and Strive for Achievement: The 60-year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China Three Gorges Museum in Chongqing (1)

Xu Lianggong

- Xu Zhongshu and the Museum Undertaking (7)

Zhang Li

- Xu Zhongshu and the Southwest Museum (22)

Feng Shimei

- Remember My Late Father Feng Hanji (31)

Xia Huogen

- Feng Hanji and the Southwest Museum (37)

Gong Tingwan

- Cultural Relics Preservation along Baoji-Chengdu Railway of Southwest Museum (46)

Hu Changjian

- Cultural Relics Origin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Southwest Museum (53)

Gao Yuan

- Academic traditions of the Southwest Museum (61)

Chen Liqiong, Dong Xiaochen

- Dehua Kiln White Porcelain of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from Three Gorges Museum ... (77)

Tang Yeze

- Preliminary Study on Chinese Lute of Past Dynasties in China Three Gorges Museum (85)

Tang Shaobo

- Analysis of "Tsaka" Implication (97)

Deng Youping

- Red Army Handwritings of Tucheng Battle Collected in China Three Gorges Museum (103)

He Cunding

- Discussion of Old Stones in Chongqing—in terms of region environment (111)

Ai Zhike

- Research on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nti-Japanese War Relics in
Urbanization of Chongqing (120)

Wang Yuru

- Museum Services and Education to Children (129)

弘懿一甲子 奋进六十年

——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馆 60 周年

黎小龙¹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 400015)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迎来建馆 60 周年华诞。

1951 年 3 月，在主政西南的邓小平亲自关心下，西南博物院创建于西南大区首府重庆。六十年间，历经西南博物院、重庆市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建国初的西南博物院，汇融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重庆地区积淀的丰厚文博资源，名师才俊云集，俨然为西南文博之翘楚；重庆市博物馆时期，肩负重庆文博事业的历史使命，先后筹建衍生了重庆自然博物馆、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市考古所等一批文博单位，奠定了重庆文博事业基本格局；近 20 年间，举全馆之力投入三峡文物的抢救和保护，直接催生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创建。这座崭新的博物馆，内涵了重庆优势文博资源的整合，位处重庆都市文化的中心，荣获建国六十周年 100 项“经典暨精品建筑”盛誉。免费开放以来，年均接待观众 160 万人次，先后跻身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培育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六十年，蕴含了历代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展现了几代博

物馆人殚精竭虑、艰苦奋进的可贵精神，反映了重庆这座城市起伏跌宕的发展历程，可谓中国博物馆事业的重庆实践。

一、志存高远 西南博物院的坚实起步 (1951—1955 年)

西南博物院的创建，直接原因是成渝铁路沿线文物的抢救与保护。而重庆作为西南大区军政中心的地位决定，建国初期重庆原有博物馆的整顿和西南地区文博资源的调配，须以西南博物院为中心进行整合，从而发挥其“西南区立博物院”的地位和作用。

伟人关怀 针对成渝铁路沿线文物抢救和保护紧迫，邓小平于 1950 年提出，若文物受到损害，“就是我们这辈人的罪过”。所以，邓小平通过亲自组建考古团和部署成渝铁路沿线文物的抢救和保护，推动了西南各省区的文物保护工作；通过筹建西南博物院召开西南地区首次文物保护工作会，谋划和部署西南各省区文博事业的全面开展。据这时期的规划思想，西南博物院定位为“西南区立博物院”，“西南区的中心博物院”。该院将逐步建成“五馆一所”的博物馆群体系，包括：历史馆、自然馆、革命馆、美术



1. 黎小龙，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

工艺馆、民族馆，以及独立的研究所。并要求“五馆”均应构建旨在教育民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爱国主义的五大陈列展览体系。这些规划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指导着重庆文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时期西南文博资源的整合，首先体现在西南博物院领导结构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博物院正副院长四名：院长徐中舒，副院长冯汉骥、周素园、方国瑜，除周为社会名流外，其余三人均为西南著名高校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名师大家。尽管周、方二人未到任，但在徐、冯二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史学与文博界的精英和骨干汇聚到西南博物院（封三·1、2）。由此可见当时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和领导集体高远的眼光和宽广的胸襟。

坚实起步 西南博物院的创建，最为紧迫的是“保护古迹文物”。通过数年的艰辛努力，西南博物院的文物藏品，以建院之初西南文教部拨交的2万余件为基础，至1954年底增至10万余件（102478件），更有清代巴县档案13万余件的收藏和整理。其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社会流散文物的收集；二是重庆文博资源的整合，如1953年将西南人民科学馆并入西南博物院，经二十余年积淀的自然标本和文物藏品一同并入；三是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个人捐赠应是建国初期传世文物入藏西南博物院的最主要来源，以王瓚绪、卫聚贤、申彦丞、汪云松等三十余人为代表的个人捐赠，不仅数量巨大，且价值甚高，其中不少为抗战民间“西迁”文物。抗战时内迁重庆的卫聚贤捐赠文物达929种，18400件，而申彦丞则捐献6700件个人收藏。王瓚绪捐赠的300余

件历代书画，一级文物44件（套），二级文物96件（套），其中有南宋马麟等《杂景院画册》、元佚名《仙山楼阁图》等精品书画。

五大展陈体系的规划，在这时期初步形成。数年间，先后举办17个引起广泛社会影响的专题展览，如《西南区文物展览》、《宝成铁路出土文物展览》、《西南主要矿产展览》、《川黔革命文物调查征集汇报展》等。在这些展览的基础上，博物院基本陈列的展陈体系在这时期逐步建立和完善，历史、自然、革命、民族四个体系的基本陈列向民众开放。1955年来馆观众达到30余万人，更有一天达六千人以上的拥挤场景。这在当时有限的场馆条件下，实属盛况。

西南博物院时期的科学研究，一开始即以考古发掘和馆藏文物为主。新中国第一批重要的考古发现，如“资阳人”，成都羊子山墓群，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船棺葬等，均在这一时期问世。其中，“资阳人”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人类起源和旧石器时代人类分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船棺葬的出土将巴蜀文化研究引入了实证阶段，意义非凡。正是在这些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徐中舒发表的《巴蜀文化初论》引发继抗战之后的第二次巴蜀文化研究的论争和高峰，开辟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五馆一所”博物馆群的建设，随着1953年以自然为主体的西南人民科学馆的并入，西南博物院以历史、自然为主题的博物馆群已奠定其雏形（封三·3、4）。

可见，西南博物院的4年多时间内，切实承担了建国之初全面推动和开展西南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这时期的西南博物院，名家才俊云集；初步奠定立足重庆、覆盖西



南，传世文物与出土文物并重的文物藏品格局；并据此构建起地域特色鲜明的陈列展览体系；“五馆一所”的博物馆建设也展现其雏形。西南博物院追随着重庆这座城市在西南的特殊地位，充分发挥了“西南区立博物院”的影响和作用，在新中国博物馆建设发展的初期，就不同凡响地迈出坚实的起步。

二、时代烙印 重庆市博物馆的艰辛探索（1955—2005年）

1954年底，西南大区撤销，西南博物院于1955年6月更名为重庆市博物馆。在邓小平的关心下，新馆迁至枇杷山原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大楼，开始了长达50年的探索历程（封三·5）。以十年“文革”为限，重庆市博物馆时期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历经“大跃进”、“文革”，仍坚守西南博物院以来的既定办馆理念和传统，坚持“三性二务”的社会责任与任务，为重庆文博事业的发展刻苦奋进；后一阶段举全馆之力投入到三峡文物的抢救与保护，成效显著，直接迎来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新的发展时期。

重庆市博物馆肩负着区域中心馆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为重庆地区文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带动和引导作用。1958年5月红岩革命纪念馆历经三年筹建和代管而正式开放，西南博物院规划的“五馆”中之“革命馆”，继历史、自然两馆之后正式建成。重庆市博物馆的博物馆群体系，除市中区、北碚区外，又增沙坪坝区的“革命馆”，较之西南博物院更趋完善。从1964年筹建“美蒋罪行展览馆”始，由重庆市博物馆筹建衍分为重庆市独立文博单位的，计有：红岩革命纪念馆（1964年）、美蒋罪行展览馆

（1964年）、重庆自然博物馆（1991年）、黄山陪都遗址陈列馆（1993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年）。40余年间，重庆大多数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的筹建和发展，都有重庆市博物馆的参与和努力，从而奠定了重庆市文博事业的主体框架和基本格局。

这时期的考古发掘，1957年合川马门溪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恐龙化石。1976年发现的“铜梁文化”把重庆市原始先民的活动推进到距今两万年以前。1981年开始的四川自贡大山铺恐龙发掘，在恐龙发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85年秋，“巫山人”化石的发现对东亚人类起源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涪陵小田溪战国墓葬作为“文革”中首批恢复田野考古工作的遗址而备受学界关注。涂山宋代瓷窑的发掘为黑釉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从1958年始先后开展了7次长江水文考古调查，开拓了“水文考古”这一文物考古工作的新领域。

伴随三峡工程的上马，1997年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作进入大规模实施阶段。我馆作为“东道主”，在重庆库区文物保护中既参与了整体的统筹、协调以及资料保管工作，同时作为业务主力担负了大量地下文物抢救发掘、地面文物搬迁保护工作的重任。从1997—2002年，我馆的考古队在重庆库区主持发掘了巫山大溪、万州苏和坪、万州黄柏溪、万州麻柳沱、丰都玉溪坪、丰都石地坝、涪陵小田溪等遗址，发表相关简报、通讯百余篇。其中，巫山大溪遗址的发掘获得了2000年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三等奖”。

50年来，通过考古发掘、民间征集、各地文博单位调拨等多种渠道，极大充实了



馆藏,使我馆藏品逐步臻于完善和系统。1956年起,先后接受了罗伯昭、康心如、康心之、申彦丞、柯尧放、李初梨等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李初梨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早向国家捐献大量珍贵文物的党的高级干部,他的高风亮节在党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当前文博界有识之士提倡的“收藏今天”,从西南博物院时期注重重建文物、革命文物、民族文物,到重庆市博物馆时期拓展到当代艺术品、抗战文物、重庆城市发展的文物收藏,数十年遵循着这一收藏理念。



这时期的陈列展览和社会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仍沿袭了原有的传统,以《历代文物艺术品陈列》、《重庆城市发展史展览》和《四川恐龙化石陈列》、《四川脊椎动物陈列》为基础,逐渐构建起了以西南民族文物、重庆历史文物、自然标本、革命文物、历代瓷器、书画展览为主体的基本陈列体系。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馆共举办临时展览近200个,这些极具时代特征的展览,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激发人民群众热爱祖国、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等方面,发挥了极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在“文革”时期,我馆职工仍然一如既往地履行着博物馆人的社会责任,先后举办展览11个。其中《长江流域水文考古展览》、《建国以来出土文物展览》和《自贡恐龙化石新发现展览》等,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在国内文博界产生较大影响。

改革开放后,各种新理念在探索实践中逐渐清晰。1979-2004年间,共举办临时展览120余个。其中,原创性展览50余个,占到展览总数的40%以上。这一时期,我馆

成为重庆市重要的涉外接待窗口,对外文化交流日渐活跃。利用馆藏恐龙化石骨架、汉代画像砖、绘画、三峡出土文物等文物精品,精心制作了《中国四川恐龙化石展览》、《重庆市博物馆珍藏十四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展》和《长江文明的华彩乐章——三峡文物保护成果展》等展览,先后在日本、法国、美国和香港等地精彩亮相。另一方面,这时期引进的德国、丹麦、法国、日本的境外展览让博物馆重现生机,为渴求文化生活的重庆市民带来了久违的精神享受。此外,加强国内馆际交流合作,成功引进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内蒙古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自然博物馆等文博机构的展览。

重庆市博物馆的学术研究,秉承西南博物院时期严谨、务实的治学系统,逐步形成了以巴蜀文化、馆藏文物、重庆地方史、抗战陪都史、西南民族史、古生物和古人类,以及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主体的科研框架,较多重要学术成果在这时期涌现。《巴蜀史稿》、《巴史新考》、《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氏族史》、《四川汉代石阙》、《巴蜀汉代画像集》、《古代陶瓷研究》、《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重庆大轰炸图集》、《四川盆地侏罗纪恐龙及其地层》、《剑龙》、《蜀龙》等数十部著作在这时期问世。

这一时期,我馆提出了“巴渝文化”这一概念,用以指称重庆地区的传统文化。其后,陆续编辑出版四辑《巴渝文化》,收录相关研究论文近百篇。“巴渝文化”的提出,引领、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以及后来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促进重庆的文化建设、弘扬重庆人文精神作出了杰出贡献。

重庆市博物馆时期,继西南博物院之

往，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之来，经受了“文革”十年动乱、“市场经济”的先后冲击和考验。在半个世纪里，它探索并实践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规律，成功实现了博物馆事业的上升发展。

三、崭新起点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的创新发展（2005 年至今）

三峡工程文物抢救保护工作的现实与展现长江三峡历史文化遗产的需要，孕育并催生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今天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受益于筹建初期具有远见卓识的两项决策：其一，立足于重庆文博优势资源有效整合的战略布局，将具有 50 余年历史的重庆市博物馆和新建的三峡博物馆合并组建；其二，新建博物馆选址渝中半岛之中心位置，与重庆经典建筑重庆人民大礼堂东西呼应，共同形成重庆都市文化中心，凸显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标志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图一）。

近年来，重庆博物馆事业的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并正式确立进一步整合重庆文博

资源，构建“五大博物馆群”和五个展示体系的规划，即：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抗战文化、工业文化遗产、自然与科技。2011 年 2 月，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正式并入我馆，“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为龙头”构建历史文化博物馆群的规划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我馆研究人员全面参加了重庆市抗战文化遗产和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在抗战、工业两大博物馆群的建设中承担了基础研究、文物征集和前期规划工作。2010 年 4 月我馆牵头成立了“中国西南博物馆联盟”，旨在资源共享、人才培养交流等诸多方面加强区域协作，共谋发展。

文物藏品的收集，近年来我馆除坚持丰富珍稀品类和完善藏品序列的传统外，也更加注重三峡出土文物、抗战文物、工业遗产和民族文物的收集，“四川画派”、“巴蜀画派”当代艺术品也列入收集的重点。致使馆藏文物日臻丰富，藏品系列日臻完善，藏品特色日臻凸显。截至 2010 年底，馆藏文物近 18 万件（套），文物资料及清代、民国



图一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邮票 100 万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 682 件，二级文物 1400 件。形成了以古人类化石标本、三峡文物、巴蜀青铜器、汉代文物、历代陶瓷器、历代书画、西南民族文物、抗战文物、革命文物、古琴、历代钱币、“社建”文物资料等为特色的藏品系列。

科研条件在近年获极大改善，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逐步构建起一支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展示的专业队伍。近年来，本馆整合内部科研力量，成立“三峡古人类研究所”。着力建设“142”科研平台，即 1 个研究部；4 个研究所：三峡古人类研究所、三峡区域文化研究所、抗战文化研究所、城市与工业遗产研究所；2 个中心：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三峡文献档案信息中心。创办了学术刊物《长江文明》，追踪长江流域的文博动态，刊载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我馆主持或与其他科研单位合作进行的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逐年增长。在此基础上，重点加强馆藏文物有害生物控制、馆藏文物、馆藏历史文献、三峡历史文献四个领域的研究，并集中资源加强馆藏文物有害生物控制实验室建设。

我馆紧随国内国际博物馆发展新趋势，坚持以陈列展览为载体，以更加友好开放的姿态发挥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阵地”作用。在 10 个基本陈列之外，近年来年均推出原创性展览和引进优秀展览 30~50 个，包括由我馆原创策划的《长江文明展》、《重庆岁月——海峡两岸抗战文物展》、《巴山凤鸣——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历代古琴展》等。先后与美国西雅图贝克博物馆、英国威尔士国家博物馆、法国图卢兹博物馆、

埃及努比亚博物馆等国外知名博物馆签订友好合作意向书，并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秘鲁、俄罗斯、印度、日本、意大利、以色列等有关文化机构开展文物艺术类展览交流活动，进行学术互访。

面对观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馆积极探索服务社会的新思路，在公众服务和社会教育方面，推出一系列贴近实际、贴近社会、贴近群众的活动。开馆后招聘了一批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讲解员，坚持讲解培训，鼓励外出交流竞赛，针对不同观众群体编写多套讲解词，采取多种形式的讲解方式，获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讲解员队伍成为我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招募和培训数百名志愿者队伍，其中的小小志愿者受到观众的特别欢迎。为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坚持定期开展观众问卷调查和分析，并针对提出的问题改进管理与服务质量。社会各界盛赞博物馆免费开放极大地丰富了公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2008 年免费开放以后，当年接待观众 171.1 万人次，2010 年达 168.2 万人次，参观人数比免费开放前年均净增约 100 万人次。

弘懿一甲子，奋进六十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 60 年历程，凝聚了数代重庆人的文化情感和时代期盼，它的冷清寂寞与鼎沸喧腾，它的苦涩艰辛与昌顺兴旺，都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熔化为重庆这座城市的文明记忆。今天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欣逢文化繁兴之盛世，肩负文化民生与文明传播之重任，当发扬几代重博人积淀而成的优良传统与文化精神，竭诚服务民众，恪尽职守业务，专力提升发展，为重庆长江上游文化中心的建设和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徐中舒先生与博物馆事业

徐亮工¹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 四川成都 610064]

提 要: 徐中舒先生一生与博物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博物馆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徐中舒先生主要参与了四川省博物馆的筹建, 主持建立了西南博物院(今三峡博物馆前身)并任第一任院长, 在文物征集、科研调查、资料收集、人才建设、机构设置等方面奠定了四川及重庆文物事业的基础。

关键词: 徐中舒 西南博物院 博物馆事业

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提出:“吾辈生于今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 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有百家不雅训之言, 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 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陈寅恪先生亦言:“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 得预于此潮流者, 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 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 非彼闭门造车之徒, 所能同喻者也。”^[2]

徐中舒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始于1925-1926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的学习中。先生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古史二重证据法, 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其扩展, 从书里到书外, 从文字到实物, 从古遗物到现世所存, 无不纳入先生的学术研究眼界中, 从而

将古史二重证据法发展为三重乃至多重证据法。因此, 先生对古代遗留的物品尤其予以关注。在徐先生早期的学术研究中, 古器物学研究成为他的一个关注重点。1947年11月, 徐先生被提名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 在“合于院士候选人资格之根据”一栏, 徐先生作为候选人资格的理由是“用古文字与古器物研究古代文化制度”。^[3]通过古器物来研究古代文化、生产、生活状况, 这在徐先生一生的研究中, 占有较大的比重。在徐先生眼中, 古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器物, 正是古人生产、生活状况的反映, 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又一重要史料。进入史语所及其后数十年间, 徐先生在古器物的研究领域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 《耒耜考》、《古代狩猎图像考》、《弋射与弩之渊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说尊彝》、《论古铜器之鉴



1. 徐亮工, 男,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 编审;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别》^[4]、《关于铜器之艺术》、《关于骷髅作酒器的通讯》^[5]、《蜀锦》^[6]、《谈古玉》^[7]、《论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虚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8]、《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原》、《古井杂谈》、《古代都江堰情况探原》^[9]、《罍于与铜鼓》等。^[10] 因此，徐先生对于古代遗物的发现、保存及展出诸事很早就予以高度的重视。徐先生的古器物学研究，与古董玩家们的意趣迥然有别。1934年，针对当时古器物学研究的状况，徐先生在《弋射与弩之渊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一文中提议：“吾先民日常习用之物，如舟车屋宇兵器农具之类，其形制仍保存迄今者，所在多有，其有裨于考古如此类者，必不少，近来外货益深入内地，此类遗物日就湮灭，若不及时搜集，数十年后将无从征考。间尝与友人裘子元、梁思永两先生谈，欲设一博物馆搜集现代地面一切用具之实物或模型。”先生这一提议，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11]

1929年9月，即徐先生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半年后，中研院接收了设在故宫的历史博物馆，交史语所代管。当月29日史语所所务会议议决：成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组织筹备委员会，傅斯年、陈寅恪、李济为当然委员，朱希祖为委员长，裘善元、董作宾、徐中舒为委员。这是徐先生参加现代博物馆事业的开始。^[12] 1931年8、9月间及1936年10-12月，先生两赴上海，与上海善斋主人刘体智先生洽谈收购善斋所藏古物事宜，几经反复，终于以较廉之价为国家收回了散落在民间的大批珍贵文物。^[13]

1938年10月，四川大学成立“博物馆

筹备委员会”，邓只淳任主任委员，先生与朱光潜、冯汉骥、蒙文通先生同为筹备委员会委员。1939年，川大迁往峨嵋，“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已搜集到的两千件文物遗留在成都皇城原川大校本部内。1941年，经四川省教育厅与川大协商，以该批文物为基础，由四川省教育厅和四川大学联办“四川博物馆”，该馆名一直沿用至1949年底。1950年代初，该馆名一度改为“川西博物馆”，1956年西南区撤消，该馆始称“四川省博物馆”，即今四川省博物院前身。^[14]

1951年初，徐先生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文教部之约，与冯汉骥、邓少琴先生受命主持西南博物院的建院筹备工作。3月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部长楚图南主持召开了筹建西南博物院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次日，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下设秘书处；聘请先生担任副主任秘书，负责具体办理筹备建院事宜。^[15] 当年7月1日，先生与冯汉骥、邓少琴先生赴重庆筹备西南区文物展览，^[16]并先后调原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毕业的学生于豪亮、沈仲常、王家佑、徐鹏章、董其祥、冯汉鏞等人到渝参加工作。据沈仲常先生回忆：“西南博物院成立之初，……他们三位先生（笔者注：指先生、冯汉骥先生和邓少琴先生）原来皆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又兼从事文物考古的研究工作，并都热爱文博事业，同时他们三位老先生的私交甚好。所以在西南博物院筹备阶段，即开始在成渝两地收购流散文物，……在短短的时期中，新成立的西南博物院的藏品不断增加，这既使流散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同时又及时地充实了西南博物院的库藏。其次，在西南博物院筹备之初，先生即着手选



聘了社会上热爱文博事业的中青年干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筹备、挑选，基本上将博物院各部门的主要业务骨干配齐了。……由这批业务骨干组织各部门的工作，所以当时西南博物院在短短的几年中，业务工作蒸蒸日上，后来即由这批业务骨干参加宝成铁路文物保护委员会工作，配合基本建设抢救出土文物，清理、发掘、保护文物的宣传工作，也作出了极大的成绩。那时的西南博物院是属西南行政大区的，博物院的工作除了四川以外，还要兼顾云南、贵州的工作，工作量极大，全院的同志极为忙碌，博物院的领导层团结一致，全体同志们忘我的工作，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中，不但安排妥当了院内各部门的工作，解放后四川最初的田野考古工作，亦全面开展。……先生还亲自编辑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主办的西南区文物展览的‘画刊’，这是解放后我省首次编印的画刊，同时也是四川省编写最精的文博‘画刊’，这在当时文物保护的宣传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7]

7、8月，这正是重庆一年之中最热之酷暑，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展开的。“今年重庆各机关搭席蓬买电扇，致使此两业形成极繁荣概况，此间买了八座华生电扇，每座百万。”“来此忽忽一月，初时旬日甚热，又旬日阴雨较凉，又热十天，弟参与了西南军委会直属机关加强内部统一战线会议，共费四日，颇感苦热。”^[18]

9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裴文中处长来四川参加土改工作，听说本年5月发现的“资阳人”没有地层关系及共生动植物资料，欲赴发掘现场考察。先生陪同裴

文中先生及西南文教部副部长李长路一道赴北碚和歌乐山进行考古调查。后先生又派徐鹏章等一批业务人员随裴文中先生前往资阳黄鳝溪作正式考古发掘，终于找到了“资阳人”唯一的工具——骨锥。^[19]

10月3日，经多方筹备，西南区文物展览正式展出，至11月5日结束。至此，西南博物院筹备工作顺利完成，西南博物院亦于文物展览正式展出之机宣告成立。先生任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先生任副院长。11月中旬，先生由渝返回成都。^[20]

1952年，由郑振铎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先生为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周素园为副院长，邓少琴任秘书。

西南博物院从无到有，筚路蓝缕，从选址到房屋修缮，从经费使用到人员调配，从文物征集到展览筹备，事无巨细，先生无不过问，这从先生本年7月15日至11月5日致闻宥先生的十通函件中可以清楚看到。在本年8月1日致闻宥先生函中，先生认为“此时在土改期中，文物易于流出，过此恐即不易遇见”，故请闻宥先生“在蓉收购文物希大力进行”。同时，先生分别致函上海的顾廷龙、徐森玉先生，请他们代博物院在沪购买必要的参考书籍以及文物。此当出于先生抗战前夕在沪收购刘体智家藏铜器之经验，社会每逢遭遇大的变动，往往是国家回收文物之最佳时机。先生不仅关注文物的征集和保藏，更关注文物的使用和对古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建院过程中，先生十分注意为博物院购买书籍，7月15日致闻宥函即云：“关于博物馆参考用书，亦有五十万预算，成都方面有适用之书籍，请代留意，并将书目书价开示为盼！拟赓即去函京



沪托人代购，……学林请彦威兄多寄几份全份为盼。”8月1日函中又称：“今日接到傅金榜、张桂林合寄一书目来，拟为院选购若干参考书，书目另附，弟亦拟选购数种，祈兄代为说价。因其所开书值较弟等在蓉不啻已倍蓰有余矣。”8月2日函中则云：“顾起潜先生在沪住址祈见示，因欲托渠在沪代购参考书籍也。成都如有此类书籍，乞为烦神代购。其价似可酌予提高。至如北大、清华、燕京、中研、北平研出版刊物，如有全套及零星并请留意。”8月29日函中可知当年购买书籍的艰难：“顾起潜先生处已由上海来董一阁转去一函，业已得复，渠意我院应与徐森玉先生联系，徐现任华东文化部文物处长，顷已去一函询可否托其在沪收购古物及考古书籍，现在京沪考古书籍甚昂，西南人民图书馆托顾子刚在京代购一批约千册，费六千余万，我院近在购上海美术考古学社长沙漆器图腾艺术四册，亦费二十余万。”

另外，在西南博物院筹建和文物展览的准备过程中，徐先生仍关心博物院的长远发展，在院中设研究室、在成都设工作站和派调查队外出调查均已提上日程：“下年拟派出两个调查队，兄及你馆同人愿意参加者否？路线如何，能惠示意见尤所企盼！”“如出外参加调查，成都亦是一工作站也。成都办事处有成立必要，李部长及马科长现皆在蓉，请兄与马商谈一下，请其即向华大当局商量拨用数间房屋如何？将来与兄合作之事甚多，楚部长曾提出博物院要办研究室（或所），有与华大文研所合作之意，惟不知尊意如何？”“尊拟到乐山调查，弟与汉骥、少琴完全同意，预算拟定为八百万，明日即

可送文教部，谅亦可同意，请兄即准备一切，俟部方批准，即将款汇奉。贵州调查如有暇请为作一计画，不妨大规模的，兄的一部分，可以留待明年作，如何，至希斟酌。”“研究室主任一席蒙兄慨允，至为欣感，俟楚部长返渝（到京开会去）再为奉达。乐山调查事请兄不必顾虑，认为可去时即请前往，我院或可派一人前往参加，一切请兄主持。”^[21]这些计划虽然由于此后的行政变动等原因，未能完全实行，但徐先生对博物馆事业的规划思想已于此可见一斑。

1952年初，三反运动展开，徐先生在西南博物院参加了这次运动。这应是先生第一次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2月18日，先生在院里作了关于三反运动的检查，分别列举了自己所谓的“贪污事件”四起，“浪费事件”十起，“官僚主义”六起。在“检查”的开始，先生即称自己：“我是一个没有行政经验的人，在来担任我院工作以前，从来就坐在书房里作研究工作，没有触及自己业务以外复杂人事，对于社会的关系也很简单，没有党派，不讲交际。在接受我院任务时，我也曾多方考虑，总觉得没有把握将工作搞好，但因为组织上既经决定，我应当服从，再说，组织对于我的认识也非常清楚，所以同时征调冯汉骥、邓少琴两先生来协助我工作，冯、邓两先生的学识和经验，是我素所了解佩服的，我能向他们学习，一定可以把工作搞好，因此我就鼓起勇气来承担责任这个任务。不过我从开始接受任务之时，就存了这种情绪，就是领导上依靠组织，内部事务依靠邓先生，业务依靠冯先生，就这样来搞工作，当然先天的就形成了一种瘫痪、等待，遇事趑趄不前，不能争取



主动，这些现象。所以我在领导期间，时间虽短，而犯的错误却数不胜数。”这里所说并不全是违心之言，我们在徐先生致闻宥函中已可感觉这种情绪的存在，为调董其祥来院工作屡受周折：“董其祥调用公函，为人事科及高教处稽压至今，前往查询数次，均不得要领，今日已再去一函催办，主管人已答应可办，大致亦不成问题了。……在人事科方面，一方是慎重，如稍有问题，即要了解，一方是怕以上级命令式调用，怕下级虽不愿而奉令后就要照办，结果就都不办，而又不通知我们，我们又何从了解这些情形呢？”为文物和书籍从成都运渝事，大约也是被有关方面多有刁难：“装箱交邮运渝最好，免得再去函官府交涉。”而关于博物院今后的待遇及人员地位问题，先生亦颇有难言之处：“此间事诚如言者，所论列不如教书较好，吾等今日尚在挣扎，待遇方面期与大学相等，以昔日中研言，其不及教书处甚多，但亦有可取处。今日亦期望如此，有人言如要有好出路，要看此次展览，希望吾兄多予臂助可以借作展览用或收购多展览用之物。”^[22]至于先生称自己“我是一个没有行政经验的人，在来担任我院工作以前，从来就坐在书房里作研究工作，没有触及自己业务以外复杂人事，对于社会的关系也很简单，没有党派，不讲交际”，也不全是实情。当年先生在史语所主持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时，傅斯年先生在给蔡元培院长的一封信中曾对徐先生有一评价：“档案整理，已可作第二步之刊行。中舒先生善于布置，有事务长才，故工作进行得以迅速，至可喜也。”^[23]另外，当年史语所由北平北海公园静心斋迁往南京北极阁新建所部时，所

有的事务性工作都是由先生率同仁完成的。这里的所谓“没有行政经验”，可能更多是因为时代改变了吧。三反运动后不久，徐先生就离开西南博物院，回到四川大学历史系。^[24]其间原因至今不得而知。

1952年院系调整，华西大学博物馆调整至四川大学，成立四川大学博物馆，交历史系管理。时徐先生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该馆移入川大后随历史系数次搬迁，在文史楼时，始得有空间得以展出所藏文物，但范围亦小，主要是配合中国古代史教学及为校外领导及专家参观之用。徐先生在此期间屡受政治迫害，曾一度被取消教学资格，“文革”中更是成为川大乃至四川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典型，被川大扫地出门，至“四人帮”打倒后方得平反。故于川大博物馆，徐先生大约没有与之发生太多的关系。

1977年3月7日，徐先生的好友、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始人、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先生因久病不治，与世长辞。至1979年年中，四川省博物馆馆长一职长期空缺。当年8月底，四川省文化局陈局长和四川省博物馆几位副馆长到徐先生家，请先生一起到省博与大家见面，宣布徐先生正式兼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此事省文化局已多次与先生联系，先生曾多次表示自己年事已高，全无精力管理省博事宜。“好在说明是挂名，将来只在学术发掘方面出点主意，提点意见，外宾中有必须接见的，还要去接待一下”。^[25]这大概是徐先生一生中第五次与博物馆事业相联系，也是最后一次。从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委员始，至1979年兼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止，正好半个世纪，徐先生与中国现代

